

On Brightness of Mind

A Study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Ontology of Mind

大道哲学全书

心性灵明论

—— 关于人文精神
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司马云杰 ◎ 著

“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大道即形上之道，即宇宙万物本体存在，即察天地之变，洞万化之原，由万物阴阳化育的法则提升出来的宇宙原理，以及由此获得的纯法则、纯概念、纯理念与纯粹真理性。此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语大，天地莫之能载；语小，天下莫之能破。此道虽为形而上者，然其并不是空悬着的，而是周流于宇宙、贯通于万物的，是道不离事，事不离道的。道体流行发用处，随处可见，故是真实无妄之理，是实有是理的存在。我之所以谓大道哲学者，即此大道本体论的哲学。道的精神，大道哲学或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重建大道哲学，重建道体的形而上学，就是重建这种精神，就是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是归复中华民族之魂。



心性灵明论

——关于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司马云杰 ◎著

On Brightness of Mind

A Study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Ontology of Mind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性灵明论:关于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司

马云杰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 - 224 - 07538 - 8

I . 心... II . 司... III . 精神哲学—研究 IV . 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3462 号

心性灵明论

关于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司马云杰 著

On Brightness of Mind

A Study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Ontology of Mind

责任编辑 朱玉 张海潮 潘丽华 黄剑波

李丽菊 许晓光 白艳妮 张雅丽

整体设计 王晓勇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 编 710003

发行热线 (029)87205074 87205196 87205054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北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mm × 1240mm 32 开 24.125 印张 3 插页

字 数 572 千字

印 数 1 - 3000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24 - 07538 - 8/B · 241

定 价 40.00 元

序 言

哲学是个人的事，更是国家民族的事。因为哲学不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事，更凝聚着国家民族的智慧，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国家民族之有哲学，特别是有微妙玄通、博大精深的形上本体论哲学，不仅说明其知性悟性能力达到了人类智慧之巅，更说明它在浩浩大化之中，建立了一个精神的家园，一个思想的安宅，一个安身立命的知觉主宰处，一个灵魂的安顿处。

当我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完成《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文化主体论》的研究写作，并以“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的名义出版这些著作的时候，中国一些人进入了最浮躁的时期。他们受外部世界的诱惑，心无所安，性无所守，凭着一颗躁动不安之心，竞于名利，逐于物欲，驰骛不息，肆意狂奔。至于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做值得吗？人们并没有好好想一想。因而使整个人生变得茫茫荡荡，毫无根底。特别是当一些流行的哲学告诉人们，心不过是血肉，性不过是食色，人不过是生物有机体，不过是刺激反应者或本能存在的时候，生活再也没有大美与崇高，再也没有神圣的东西，于是人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情逐物，呼啸狂奔，为利益占有而争斗，为欲望扩张而打拼了，甚至有的人为了饥于一饱，渴于一饮，丧本失命，狂恶不止。但人没有道德，没有良知，没有主宰，在利益面前，在金钱面前，在权力地位面前，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刺激面前，只凭着血肉之躯，只凭着本能，是无法抵挡的。特别是当人没有了道德感与羞耻感，丧失了人性的尊严与高贵之后，

在疯狂、鄙俗及愈来愈充满诱惑力与刺激性的世界面前，是很难寂然不动，立定脚跟，不流转、不翻滚、不动摇的。于是腐败产生了，堕落出现了，一些人陷入了罪恶的深渊。凡此种种，使我深深地感觉到，哲学要想担当起维护整个国家民族文化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在更高的本体论上研究人生的意义。

正如个人并不只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一样，国家民族也不是一个生物学或人种学问题，而是一群文化生命与精神生命，一种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包括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爱好、兴趣、价值观及礼仪、制度等在内的统一体。其社会历史的存在，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目的论，一种新新不停、绵延相续的文化生命精神。可以说，文化历史是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理由，而哲学精神则是其生存的纽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本体存在，可以说他们整个宇宙观、人生观及精神形式，全部是由这种文化哲学的本原性原理提供的，自然，也支配着他们对人生意义的判断。

而人生所以变得荒诞和没有意义，也在于生活与形而上学割断了联系，与本体论割断了联系，在于他们脱离了国家民族文化哲学的大原，变得小知而不能大决，小能而不能大成，顾于小物而不知大论，亟变而多私，失去了大美与崇高及至真至善的追求。然而现在世界上的人们，并不都是这样的。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或民族，他们仍陶然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从自己文化哲学的理念中寻求理想、信仰与信念。即使西方的人们，也在以极大的内心激情与终极的价值关心，归复宗教，追寻新的上帝。而中国长期以来，却一直在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批判国家民族的形而上学。面对此情此景，我在转向中国文化哲学史的研究时，陷入了沉思，陷入了国家民族如何安身立命的哲学本体论思考。我知道，中国是一个文化上早熟的民族。当世界上许多民族尚处于文化低级阶段时，中国

民族就已经隐退了上帝，开始了真实无妄、实有是理的形而上学追求。信仰及形上追求是不能置换的。把一个虚幻空寂的世界或价值设定的神秘本体存在，硬塞给中华民族，他们也是不能接受的，不能从人生与精神的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因此，形上本体论的思考，也就成了当时我哲学研究的中心思想。

我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走上哲学研究的。我发现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民族，大多是从宇宙法则秩序的均衡对称等等存在，意识到人类社会应有的真理、正义、和平、至善、自然法及国家一类观念的。当我研究中国文化哲学史，读到“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其至也，可察乎天地”；“原天地之大美而达万物之理，可观于天地”，以及“以天为法”、“总天之义，尚同于天”等等时，忽然想到，“天”在无限时空的意义上讲，不也就是宇宙吗？忽然领悟到，中国文化哲学的“道”，岂不也就是宇宙法则秩序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吗？“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岂不就是天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岂不就是相续之理？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若将上下四方、古往今来之宇宙万物法则秩序，去此去彼，去芜去杂，去掉一切偏颇及具体时空的存在，“参万岁而一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那岂不就是天道“惟精惟一”者？此道刚中而应，大亨以正，一切偏颇及非理性，皆得归于其正，岂不就是天道命令？悟得此，明于此，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理性自觉地去做，岂不就是“顾诉天之明命”？其为阴阳之道，两仪之理，动静阖辟，相推相摩，相激相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岂不就是宇宙本体与价值大原的存在？获此大本大原，上下四方，古往今来，一齐穿纽，一齐收拾，岂不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矣！我忽然明白了：这就是中

国文化哲学的“道”！这就是中华民族凭着灵明之心与巨大智慧所发现的宇宙本体真相及所建立的价值大原！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绵延及建立信仰信念的形而上学大道本体！这个领悟，今天也许算不了什么，然而在当时我激动极了、兴奋极了！好像古往今来，一切生生之道与相继之理，豁然洞开！再想一想宋明理学家所讲“圣人本天”之语，及“‘无声无臭’乃《六经》所出，《六经》所归”之议，则千古学问与道体精神，一下子昭矣明矣！悟得此大中之道与刚健之理，以贯通自我生命，得之谓德，宜之谓义，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明德者，明此；正心者，正此；诚意者，诚此；穷理者，穷此；致于命者，致于此。天道变化，万物各正性命！惟有用天地性命之理，贯通国家民族的生命，使其心有所安，性有所守，才能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才能与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那时候起，我便奋然开始了大道哲学的研究与写作。

孔子说：“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大道即形上之道，即宇宙万物本体存在，即察天地之变，洞万化之原，由万物阴阳化育的法则提升出来的宇宙原理，以及由此获得的纯法则、纯概念、纯理念与纯粹真理性。此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语大，天地莫之能载；语小，天下莫之能破。此道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存在，虽然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然其流行发用，则可见诸莺飞鱼跃、风动蛇行。其乌黑鹄白，雄鸣雌应，阳抱阴合，万物化生，无处不是此道此理流行！老子讲“大道汜兮，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这是于形下流行处说的，是谓小道；而讲“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则这是于形上本体处说的，是谓大道。故大道即形而上学的道，即哲学本体论的道。此道虽为形而上者，然其并不是空悬着的，而是周流于宇宙、贯通于万物的，是道不离事、事不离道的。道体流行发用，随处可见，故是真实无妄之理，是实

有是理的存在。我之所谓大道哲学者，即此大道本体论的哲学。

形而上，即超越形器之上，形而上学，即形上本体论的哲学。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而却没有至圣神那样。”每一个有文化哲学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都有自己文化和哲学的根本精神。正如印度人从来没离开过自己的“梵”文化精神，西方人从来没离开过“逻各斯”与上帝的存在一样，中国人、中华民族，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文化哲学“道”的精神。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垂续绵延，就是这种精神的绵延。因此，道的精神，大道哲学或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重建大道哲学，重建道体的形而上学，就是重建这种精神，就是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是归复中国民族之魂。

因此，我的研究，首先是从重建大道哲学及归复国家民族之魂开始的，从研究国家民族精神绵延与垂续开始的，所以首先撰写了《大道运行论》、《绵延论》二书。然后，我将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古今，贯通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以研究其盛衰治乱，撰写了《盛衰论》。这些年，我不仅研究撰写了这三大论，而且还回过头去，修改补充了已经出版的《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文化主体论》，使其由现象界上升到了形上界，由经验研究上升到了大道本体论高度，并提升三书道的精神。这三卷书，在内容上，有从文化价值、价值悖谬到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结构，故这次出版，为使其符合三书内在逻辑及本卷书之实际内容，我把《文化主体论》的书名与原书副题置换，改名为《价值实现论》。除上述六卷外，今后，我还要将道体纯粹之理，贯通人心人性，研究人文精神重建的心性本体论问题，撰写《心性灵明论》，以便给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哲

学理论基础。另外，将阴阳化育的宇宙原理，贯通于万物的生生化化，撰写《大化流行论》，使其同归于穷神知化的大道本体，以便为整个自然知识及现代科学提供哲学本体论根据。《易传》说：“天之道曰阴阳，地之道曰刚柔，人之道曰仁义，兼三材而两之，广大悉备。”中国的大道哲学，并不是某个方面孤立断绝的知识，而是包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在内的广大悉备的思想体系，是哲学本体论、价值论与最高知识论相统一的体系。为了重建这个体系及研究归复之路，我将撰写《广大悉备论》。除此“九论”之外，为使大道哲学精神五千年的垂续绵延深且明，我还将撰写《中国精祌通史》。以上共“九论一史”。其谓“大道哲学全书”，就是这样一套包括“九论一史”在内的研究大道哲学的书。这套书，“九论一史”皆贯通于道，皆贯通于大道哲学的根本精神。

这套书在内容上不是孤立无内在联系的，而其内在联系，也不是以写作出版的先后次序为根据的，而是以大道本体论的贯通展开的。它首先应是《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然后才是《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然后是《大化流行论》，最后是《广大悉备论》。《大道运行论》是以后各论的总纲，也是将要写作的《中国精祌通史》的导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是道体精神绵延及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贯通。《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原是作为《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出版的，列入全书，虽不像其他各卷那样自始至终贯通以道，然其修改以后，由现象界上升到形上界，皆是讲人的后天涵养、理性追求及价值实现的，或者说，皆是讲人于后天各种文化情境中取其义理、反身而诚、明心尽性立命的。故其可看作是《心性灵明论》的展开与补充，特别是《价值实现论》，可作为《心性灵明论》的上下卷来看。而《大化流行论》则是大道

本体在自然界及科学知识领域的贯通。最后，《广大悉备论》则是整个大道哲学体系的建构与总结。整套全书的内在联系，若梗概其次，则如下：

第一卷：《大道运行论》

——关于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最高精神的研究

第二卷：《绵延论》

——关于中国文化绵延之理的研究

第三卷：《盛衰论》

——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第四卷：《心性灵明论》

——关于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第五卷：《文化价值论》

——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

第六卷：《文化悖论》

——关于文化价值悖谬及其超越的理论研究

第七卷：《价值实现论》

——关于人的文化主体性及其价值实现的研究

第八卷：《大化流行论》

——关于自然本体论的研究

第九卷：《广大悉备论》

——关于大道哲学体系及其归复之路的研究

而《中国精神通史》则是道体发用流行见诸精神的历史，是“九论”征之于史者，也是史之圆而神者。

我给自己规定的目地是“九论一史”。这个计划的研究写作，虽已过半，然公开这个庞大的计划，自然要承受压力，特别是对一个已进入耳顺之年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自然，我也没什么顾虑的，

只要上天给我时间，这个计划是可以完成的，更何况我还道德使命不减，乐天知命而不忧，穷理尽性而不疑呢！

中国文化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乃至七千年，是有其大哲学、大学问、大道理的，特别是社会历史的垂续与绵延，不仅前有夏朝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的盛治，而且后有汉朝四百年、唐朝三百年、宋朝二百年的接续。中国历史上持续二百年以上的王朝就有八个。这没有强大的哲学贯通古今是根本不可能的。16世纪以前，中国不论是哲学，还是自然科学方面，哪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中国之落后，也不过是近二三百年的事。这相对五千年乃至七千年的历史盛衰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不要瞧不起自己，不要自轻自贱。只要我们振作起来，归复我们的文化与哲学，仍然可以使巍巍乎华夏，焕然乎神州，重新呈现于世人面前！然而，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我们能不能重新缔造巍巍华夏文明，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归复自己的文化，归复大道哲学，能不能使这种文化与哲学得到国家民族的体认和理解。这也正是我撰写出版《大道哲学全书》的目的所在。然中国文化哲学被人遗忘得太久了。特别是长期的批判运动，已经造成了执而不化、往而不返的局面，因此我不能不用这么长的文字，写这个序言。

哲学研究并不只是从范畴到范畴、从概念到概念，它更多的是对人及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因此它不仅需要哲学家的思辨，更需要诗人的热情，以及圣人化成天下的价值关心。我从一个农村割草拾柴火的孩子，到今天著书立说，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只是靠执著及锲而不舍的努力，走向这条道路。这自然是非常艰辛的。在这条治学路上，除了大学那些教授传统教育的老师，我在学术上是没有师承关系的，而是从文学爱好、文化社会学研究，一步一步闯入哲学，闯入形而上学神圣殿堂的。这可能使我转益多师，而不囿于门

户之见。然无名师指教，也常常走弯路。因此，我在治学道路上不得不走一步看一步，而且常常不得不回过头去，对那深一脚浅一脚的蹒跚之行所留下的印记，进行察看反思。这也正是我的著作不得不一次次修改的原因。现在这套著作所以能够出版，我首先应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朱玉先生的赏识与大力支持。另外，这套书能够得以迅速及时出版，是和该社政治理论编辑部主任张海潮先生、潘丽华女士，李丽菊、许晓光、白艳妮等朋友们的精心编校、齐心协力分不开的。其中也有美编王晓勇先生精心设计的一份功劳。在这套书出版之时，我要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

董仲舒治《春秋》，曾三年不窥园。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从不受外部世界诱惑，自甘清贫、自甘寂寞的意义上讲，我已二十年不窥园了。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几乎全是靠读者的厚爱及出版界朋友的支持，以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及研究撰写这些著作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我并不后悔，不感到寂寞。特别是这些年我用大道哲理不断地充实自己、涵养自己、大化自己，已慢慢悟得许多人生道理。每当我用生命进行写作的时候，思接千载，心体万物，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纵横驰骋，飘然远举，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自有一番独有的快乐。心不劳情于非分之思，自然没有那么多烦恼。今后我仍愿意这样生活与工作，亦愿以此换来生命的价值。如果有人问我：“当‘九论一史’完成的时候，你还需要什么？”我的回答是：“天命已了，什么也不需要了。”序此志此。

司馬云杰

2002年12月10日于花家地淡泊居

导言

天地之间，万物众生，何者最为灵明？自然是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自然是“惟人为万物之灵”。

然而人究竟为什么最为灵明呢？有些动物不是也很灵性、很聪明吗？人之灵明与动物有什么不同呢？人之所以最为灵性聪明，在于心也，在于心的虚灵不昧，在于心之洞然而虚，昭然而明，能够超乎尘外，周乎八极，在于它能够弥纶天地，贯通古今，烛明天理，使万象无所隐遁。

而人心虚灵不昧，在于人性之美与人性之灵，在于人有“好是懿德”的本性，有仁义礼智的本质规定性。此天之所赋予人者，故曰“天命之性”。人惟有此性，有此本质规定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四德备，万理俱，才生色眸然，至神至灵，才能天道变化，正得性命，才能继善成性，涵养扩充，成己成物，成圣成哲，成为天地间的伟大生命。此人卓然异于禽兽者，亦孟子所说“几希”者也。

因此，我这里所说的心，乃是指人虚灵不昧的天理之心，指以理设心，操存舍亡的存在，而不指一块血肉；而我这里所说的性，乃是指人仁义礼智的道德本性，指天之所赋、人之所稟于义理者，而不只是指食色情欲之类的本能。

这个心，乃是天渊神府的存在，是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存在，是万理俱备、集得众义的存在。而这个性，乃是天植灵根的存在，是人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灵，而不能泯灭者。此心此性，天然之灵机，造化之神府，时时运转，新新不停，不仅率性而动，天机自

张，活活泼泼，健行不息，自见天则，而且发而为明觉，烛明天理，使森然万象，万象森然，无外乎吾心。人之生天地间，有此天渊灵根，有此造化神府，有此一点灵明不息的真种子，才能万感万应，会通天地之道，至极之理，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而自我会通此理，收拾此理，得此把柄，往古来今，四方上下，一齐穿纽，一齐收拾，才能万事万化，皆出我心，才能像陈白沙先生所说那样，“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不断地进行创造性活动。此人之灵明心性之大用者也。人之生天地间，正是凭着这种灵明心性，浩浩不息地进行创造活动的。他们不仅以穷神知化的盛德，精义入神，出入利用，通变化裁，备物致用，创造了一个物质文明的世界，更是以通几微、存圣蕴、灵明不息的智慧之心，观化握几，存神入化，创造了一个个美的世界、善的世界、庄严神圣的世界及纯纯不已的世界。可以说人世间的一切盛德富有之大业，及经纶品类、层出不穷的人伦日用，无不出于人之灵明心性的创造。天下熙熙，万象纷纭，人们欢呼雀跃，争奇斗巧，以各种所谓的知识相互驰悦。然这些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可以说一切范畴概念，一切理论方法，一切原理、定理、定律，一切事实的归纳，一切理论的设定，一切经验的实证，一切逻辑的运演，一切观念理念的提出，一切法则秩序的肯定，一切信仰信念的建立，一切主义与世界观，一切见解与皇皇大论，以及种种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包括神天神帝、丈六金身、庄严色相、天堂地狱等等，哪一点不是人创造的呢？不是人凭着灵明心性创造的呢？不是出于这个本原、这个主体性存在呢？天地毁，则易不可见，则生生之机或几乎息矣！心性毁，则灵明之机不可见，则创造生化之机或几乎息矣！此心此性，灵明之主宰，创化之大原，澄明可也，存养可也，岂是可以或缺的！岂是可以亵渎、污染、奴役、遮蔽的！

然这个主宰大原，这个心性本体的存在，进入近现代以来，不仅随着西方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及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传入，变为物的存在，变为刺激反应之生物有机体的存在，失去了本体大用，而且随着哲学上极“左”思潮的泛滥，张口批“唯心”，闭口批“唯心”，更使心性本体及其灵明大用的研究，几乎成了禁忌。但是，人无灵明之心，无这个本体大原，这个天理良知的存在，还能做什么呢？宋明理学家讲“天理良知尚不能存，还做什么人”，人都做不得，还讲什么生生化化的创造呢？心失主宰则荡，性无根底则流。若心性失却天理良知的本体地位，变为形气知觉的存在，则必流荡放失而无主宰。特别是在一些实用主义哲学支配下，如坐利害胶漆盆中，以鼓动天下之私，则不仅使心性流荡放失，若游骑无所归，而且人物化，天理失，必将毁灭整个精神世界，使美的、善的、庄严神圣、纯纯不已的世界，变为物的世界、机械的世界、利益的世界、本能与物欲横流的世界。

但人并不是动物，并不只是饥于一饱、渴于一饮的存在者，而是天降衷于民，有道德本性，有精神追求者。人不仅渴望美好的社会人生，更追求大美、崇高、神圣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对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渴望一个深厚博大、高明悠远的道德精神世界。这个世界被毁灭了，也就无法解决人的信仰信念及存在意义一类问题了，也就要出现精神的匮乏与危机了。现在虽然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然而人们所以总是感到“生活没意思”，不能说不是精神匮乏与危机的表现。因此，恢复和重建人文精神，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担当的一种社会历史责任。本书正是为此而研究写作的。

中国自古以来的圣贤明哲，无不具有一种历史的担当精神。远的皋陶、伊尹、周公不说，三代之后，自孔孟至宋明理学家，哪一

位不是体认天理，涵养心性，致良知，存放心，以贞正天下性命之理为己任的呢？故清儒李颙先生说：“大丈夫无心于斯世则已，苟有心于斯世，须从大根本、大肯綮处下手，则事半而功倍，不劳而易举。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处，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这在宋儒张横渠先生那里，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像古代圣贤明哲那样进行历史的担当，然心往之。故奋然向前，著作此书，为恢复重建国家民族的人文精神，尽一份自己应尽的责任。

欲唤醒人心，惟在明学术。因此，重建国家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担当，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重建哲学的心理本体论学说。这自然首先要从学术上弄清其基本理论范畴概念。为此，本部论著不仅一开始就提出了进行这种担当的历史责任与研究任务，更在其后几章，不得不花巨大的篇幅，研究心性本体论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为了弄清心性的根本性质与大用，本书不仅探讨了古代圣贤明哲关于心性本体的论述，更开出专章研究了心性本体的灵明知性及其体悟通神、转识成慧的能力，并亲临精神的诞生，研究了灵明心性在精神创造中起经纶、出万象、超常伦的主体性作用。惟知心性本体之大用，讲精神创造，讲万化在我，方有商量；舍此，则是外道，则是舍本逐末之学，非吾《心性本体论》之学也。那是谈不上精神创造，也谈不上人文精神的恢复与重建的。

自然，我所说的精神，不是政治宣传，不是新闻炒作，不是社会集团利益的辩护书，也不是时代风气的装饰品，而是人心人性的真诚流露，是人怀道备德，真宰常存，参赞化育，浩然同流，不断达于至善之境的生命精神。这种精神，不是物质的派生物，也不是欲望、目的、要求、动机及情感、情绪一类本能的冲动，而是仁义

礼智根于心，四端万善，涵养扩充，过化存神，浩然与天地同流者，是人的道德之心，虚灵不昧，体认天理，昭明大道，炳然宇宙，日丽河山者。人若失去天理良知，只是凭着形气知觉，于感官材料或知觉对象上求知识，取代形而上学的思考，则若暗室张灯，黑夜举火，自耀其光，照之不远，是谈不上精神及精神创造的。惟心之为体，湛然虚明，能于形上处周乎八极，超然象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良知明觉，炯炯光明，始才是人胸次洞彻浩然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之所谓精神，乃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讲的，是人凭着虚灵不昧之心，会通大道，洞彻天理，知几通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所获得的刚健、中正、仁义、至善、大美、崇高、庄严、神圣一类思想境界，而不是物的知识或心理本能一类存在。惟于此处讲精神，讲人文精神之恢复与重建，也才有商量；舍此，则非吾之谓精神也，更谈不上精神的恢复与重建。

本部论著的研究与写作，全部是围绕着心性本体论与精神创造之关系展开的。前四章主要是探讨心性本体与精神创造的基本理论，后六章则是围绕着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展开研究的。具体地讲，前两章主要是提出重建心性本体论的任务，并对心性本体论史进行了叙事性的研究；三、四两章则是研究心性本体的性质及其在精神创造中之大用的；五、六两章讲立心立命，属价值世界与天道本原问题；七、八两章讲诚明之教与道德修养，属“为往圣继绝学”之研究；而第九、十两章讲成圣成哲与盛治之道及开太平始基、重建华夏礼仪之邦等等，则属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论探讨。本部论著，前半部属于心性本体论的基础理论研究，后半部属于穷神知化、通变化裁的应用研究。但基础理论研究并不仅仅是范畴概念的讨论，而是亲临精神的诞生，研究了中国特有的精神现象学；而应用研究也并非经验实证，而是牵涉立心、立命、继绝学、